

略论管子的务市之道

李承烈

古代称的市,即交换合用物产和买卖商品的事宜、领域和场所。如今天的商业贸易。对市之业从事或管理的行为,谓之务市。国家政权务市,即为市政。务市有自身的内在联系和理论。齐相管仲(公元前730~645年)市理渊博,务市有方,市政绩著。管子处于我国的春秋时代,少时经商,继而从政。在齐佐桓公执政四十年,力握国政,律理经济,务市重效,“通货积财”,从财物上保障了齐国的富民、富国、强兵、“尊王攘夷”政策的贯彻,实现了“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目标。管子在治国、理财、务市的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经济思想体系,务市之见论含括其中。管子的经济理论与治国政绩,遂后陆续辑录成文,载入《管子》成为管子学典籍。兹为鉴古治今,仅将其务市之道,略加理释,简陈于后:

一、市之兴源

市的实质是产品交换。市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社会上市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的进步,产品的增多应运而生的。史实表明,华夏封建制初期,春秋之世,东周齐国、庶民众多,国土广阔,东滨大海,西连中原,自然资源丰富。当时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操作技能日益提高,生产逐步发展,产品渐趋丰富并出现互有余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要彼此调剂,交换产品。从而产生了市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商业贸易业务。市之业前连生产,后接消费,居经济的中间环节,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管子透识齐国社会及其市业的实况。就而论之曰:“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这里所阐明的是:(1)人类聚成社会,解决生活、生产用产品余缺的矛盾,就必然产生相互交易的市,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2)社会上缺乏物品交易,社会经济就匮乏,民众和国家就会贫困,乃至因而社会动乱,国难治理。管子进而就齐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王·小匡》)这就道出了当时齐国物品交换已经相当发达,有了普遍的经常而巩固的市业活动。并且出现以营市为专业的商民,国内的商民在稳定地壮大,达到可与士、农、工各民并列构成国家四大基础民众。由之也可以看出齐国市业的兴盛。

二、市具功能

实践表明,市与其他事物一样,有自身本质决定的功能。其功能的发挥就产生作用。管子阐之曰:“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道。”(《管子·乘马》)又云:“市赋百取二”(《管子·幼官》)这里阐明了市的实质;(1)市是产品价值的衡量者,产品入市交易可知其价值大小。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创造的满足社会需要

的产品，其中都凝结着一定数量的劳动形成了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在入市交换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2)市的交换只能衡量产品价值量大小，而不能创造产品的价值。(3)从市的活动状况可以测知社会产品交换是否顺利和国家的安定或动乱的基本情况，作为治国定策的依据。(4)市为国家政权聚集财富满足实现其职能需要的具体方式。(5)市的产品交换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增加财富，繁荣经济，以利于治国守民。

管仲在齐为相执政时，高度重视市的功能，认真运用市的诸种杠杆，充分发挥市的作用，积极促进经济兴旺。同时，实行“藏富于民”的方针，从而打下了富国的良好基础。

三、务市为国

管子认为治国守民旨在国强民富，武威称霸。这就必须发展生产，多行交换，促兴经济，广开财源，凡此均为国家的职责，市务是一项国家政务，对此论述颇多：

一曰：“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管子·国蓄》）就是说，国家若不重视经济，运用轻重之术，理财务市，宏观调控在工农商诸方面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就难以守住四方的民众，实现国家大治，此为执政的大要。

二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管子·揆度》）说的是，善于重商务市者，就应当由国家理市办商贸。各级官方办起商贸业，私人商贩就会冷落，因之，农业方面的劳力就会充足，农业就会发展，从而就能达到民众富裕。民众富裕了，国家征集社会财富就可以取之不尽。国家有了稳定而充足的财源，政权也就会巩固。

三曰：“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管子·轻重乙》）这里是说：粮食是民众的命根子；货币可以代表财富，也是务市理财必用的工具，它流通于社会为庶民百姓所运用。国君牢固地掌握货币，并运用市的办法控制五谷粟米，这样就可以用尽民力。

四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归我若流水。”（《管子·轻重乙》）所述的意思是为引进外国粮食，而运用价格杠杆，当滕鲁的粮食每釜价为一百时，齐国就将粮价定为每釜一仟。从政令上采取市场交易办法，就可以使滕国和鲁国的粮食像水泻深谷一样输入齐国。由之可见，运用市道，发展外贸就可以做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管子·轻重乙》）即运用他国的粮食备战。

五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善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管子·禁藏》）这里清楚地阐明执政者可以利用民众入市经商的图利之心，趋利之情，导民自行致富。安居乐业。

概而可谓，治国必须务市经商，国家当有经管商贸业务的市政。市业的发达，有利于国富民富，民众食、衣、住全部生活均皆宽裕，国政必顺。

四、务市要则

社会不能无市，为国当有市政，务市则有其要则。务市要则能够坚持，商贸才会兴旺，务

市要则可列为：

一是入市趋利，务市要“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管子·法法》）市为产品交换的营运。入市贸易者交换物品旨在牟利。所以非常讲究进出量额，力求所得大于付出，这成为市道的内在要求。

一是务市重人，管子主张民有为市，国有市政，认为市与从事其他事业一样得有相应的人才。管子论之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管子·牧民》）就是说，不是天下缺乏财货，只怕无人经营管理。了解行情者可以任市务主管，无私心的可以主持政务，为国家务市。掌管国家市政者，当是德才兼备的人员。

一是依法治市，国家务市要“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管子·任法》）即是要遵守法制，而不能靠玩计谋，要图谋国家的大利，而不是谋个人的小利；要靠大的商业渠道，而不靠小办法。这样国家的市政就会兴旺起来。

五、兴市方策

管子的务市理论，是在治国中付诸实施的。对以兴旺市业，国家有相应的方策。当时制定并实行的方策主要是：

1、赋税从轻，资留于商。

（1）税率就低，齐“恒公践位十九年，他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其时税制规定：“市赋百取一，关赋百取二。”（《管子·幼官》）从此述可以看出齐国恒公之时，对于过关入市的货物所征收的赋税率是很低的，仅有总额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在农业生产方面则是“田租百取五”，即农业税率为百分之五，显然当时齐国商贸业者的税负远低于农业生产者的税负。

（2）税不重征，《管子》问篇中载有“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的制文，明确规定减少商品货物在流转中的征收环节，避免重征，以直接减少入市商人的经济负担，使其在入市经营中有更多的本钱。

（3）税制定免，齐国税制中还规定“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这样采取实减免政策，对小商小贩和无货空车予以免征。从而有效地吸引了远来商人进行交易，活跃经济，利归齐国国家。

2、招引外商，拓展市场。

想方设法招引外国商人来齐入市是管子佐桓公时的一贯商务政策。齐国为了发展外市，采取过种种惠商办法，君臣对外市问题常有讨论，在《管子》轻重乙篇中记载有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桓公曰：“皮千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可为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从齐国君与相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优待外商入市立有具体办法：为外来入市贸易者建立客馆，来四马一车的商人免费供饭，来十二马三车的外商人外加供应饲料，来二十马五车的商人，再配给五个服务人员。这样促使天下的商贾象流水一样涌入齐国市场，满足齐国所需，达到“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管子·轻重甲》）从财物方面保障齐国民富国强，盟诸侯、霸华夏的实现。

3、国有资源，控制物价。

管子在治齐理财中主张统治经济，强调宏观调控。因之，国有资源，控制物价是其又一

重要的深含市道的经济思想。《管子》海王篇中记载有桓公与管仲商讨理财治国大事时，桓公曰：“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惟官山海为可耳。”桓公进一步询问官山海的含义时，管子解释道：“官山海就是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山岳河海资源归国家所有，由各级官府掌握。同时，国家政府运用市道办法控制山上水中所出产的、民众生活、生产所必需的食盐和用铁的价格。需要时提高盐铁的销价，利归国家。这样比直接增加征收税赋，更适合于治国守民。

桓公还想到另一种情况，又问之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饘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管子·海王》）所述的意思是，当桓公问及如果本国没有山海资源怎么办？管子早有熟虑地说，可以按市道运用价格杠杆的作用，采取高于国外价格的办法，把他国的盐、铁等日用物产引入本国。这样本国也就同样有了所需用的山海产品，国家政权也因之而巩固。

综而观之，管子的务市之道，内容丰富，论策入理，行见实效。虽是二千余年前在封建初期治理齐国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显明的历史局限性。如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着古为今用精神，认真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可借鉴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上接第12页）由价值因素引起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因为它最终是由商品自身的价值所决定的，并反映商品价值的变化，所以可称为“价值价格”，而非价值因素而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可暂且称为“非价值价格”。“价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市场价格的主体部分，或称主体价格，它反映了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体，价值是市场价格的主体内容与主导因素。而“非价值价格”是商品价值因素以外的各种影响供求因素的反映，是市场价格中主体价格以外的价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供求及影响供求的全部因素都纳入商品市场价格的实际形成过程，使价格体系得以扩展，才能系统、准确、现实地理解实际的市场价格及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状况，增强价格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6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7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2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